中国1989年革命的三方面局限

June 04, 2022

中国1989年革命的三方面局限

1989年革命是一场主要由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从学生运动扩展到各个阶级阶层的民主革命。通常认为，33年前的今天是黑帮专制政府血腥镇压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开始，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遭到了失败。每到这天前后，专制政府都心有余悸地监视和拘禁与此相关的活动家，变本加厉地强化网络监视和封锁。昨天，知名网红李佳琦在直播带货时展示了坦克造型的蛋糕，随后直播间被关闭。黑帮专制政府处心积虑地不放过任何使人联想到1989年革命的元素并加以屏蔽，这种荒唐的行为反而可能造成本来不关心政治的网友探索背后的原因，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作用。统治阶级一方面在教科书上将其表述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淡化影响，另一方面尽全力用沉默来让人民忘记革命。自由派使用“六四事件”、“八九民运”等加以指代，这种淡化斗争色彩的词句将不可避免地使人们从改良的角度对1989年革命进行纪念与反思。马克思主义者纪念这场民主主义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应该珍视惨痛的失败教训，系统地进行思考和总结，为下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充分的准备。

1989年革命的第一个局限，是民主意识并不彻底。群众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公开领导人及家属的财产等要求，但他们对专制政府却只有模糊的而没有清醒的认知，对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或者某一部分抱有幻想。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乞求政府出面对话，像极了俄国农民手持圣像乞求沙皇的场面。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决不对学生让步，而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所谓改革派则对学生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仅仅是赵紫阳的口头承诺，就取得了让学生放弃斗争的效果，更在运动中后期被学生支持，作为反对李鹏、逼迫其下台的武器。实际上，这种名义上的让步只是历来被统治者用来迷惑群众的政治手腕。列宁曾经指出，沙俄的第三届杜马存在着屈从沙皇政府的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前者代表农奴主-地主的利益，主张加紧镇压革命，企图完全恢复专制政体，后者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徒有其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可以在不同的问题上轮流依靠它们。黑帮首领邓小平同样可以轮流依靠保守派和改革派。赵紫阳等之所以能够一度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政治明星，只是在运动高潮时统治集团的一种默许。一旦力量平衡被打破，政府便会公开露出其反革命面目，背弃全部承诺。保守派和改革派固然会发生冲突，但是“这里根本谈不上对冲突的任何一方加以‘支持’，因为这种支持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6卷134页）

1989年革命的第二个局限，是斗争策略不够坚决。尽管具备起义的条件，自由派还是放弃了来之不易的机会。拒绝武装群众使得军队进城时只遭遇了局部的、简陋的街垒战就成功镇压了革命。这实际是上述的思想局限在革命实践上的必然反映。实现人民的民主诉求，需要推翻专制制度，但是运动的领导者畏首畏尾，寄希望于政府的主动让步而不是推翻政府，不敢提出这个口号，不敢发动群众，暴露出自由派

及其知识分子一贯的妥协与叛卖本性。当军事镇压已经成为公开的阴谋，群众从装甲车里也成功夺取了枪支弹药，学生组织才不得不放弃改良主张，转向革命，但为时已晚。即使工人和学生分发了武器，自由派分子刘晓波依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象征性地砸坏枪支，重弹“非暴力”斗争的老调。有些枪支居然被另一拨群众还给了公安局，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从黑帮调集军队到实现镇压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因为一开始调来的军队在人民的劝说下拒绝执行镇压命令。在这半个月里，群众完全可以进行有组织的起义准备。但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的群众继续迷信“人民子弟兵不会屠杀人民”， 有意识的进攻只发生在个别地方，如5月22日晚丰台区大井附近。一些学校学生发出的武装斗争号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仓促准备的街垒战只是减缓了军队的推进速度，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

1989年革命的第三个局限，也是主要的局限，是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也没有明确的、科学的纲领。当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日渐式微，工人运动却正在兴起。5月18日成立的“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简称“工自联”）标志着运动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专制政府声明绝大多数学生和其他方面人士的本意是好的，是极少数人制造了动乱，对前者进行思想疏导，对“工自联”等组织进行无情打击。这表明政府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学生，而是来自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是使黑帮做出武力镇压决定的直接原因。工人在革命中表现了一往无前的精神，成立了“飞虎队”、“敢死队”等群众组织，为街垒战做出突出贡献，一些先锋战士被冠以“暴徒”之名，在“战地法庭”中经仓促审判，英勇就义。由于群龙无首，缺乏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法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将反抗力量融合为有组织的起义。尽管工人同情和支持学生，但是二者在纲领、组织和策略上并未取得一致，也就没有像五四运动那样真正团结起来。分散的斗争力量导致了共同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6月4日并不是黑帮的胜利日，因为在这之后的十几天里，军队还在接二连三遭到群众武装的偷袭。自由派热衷于谈论6月4日，是因为这一天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进行了清场，也就是说，自由派将学生运动的失败等同于整个斗争的失败，将自由派主导的的改良运动看得比工人革命重要。对事件的表述显露出其背后的阶级实质。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领袖声称为民主而奋斗，却在还没有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力时就已经出现了贪污腐败和争权夺利的行为，他们不配充当群众的向导。无产阶级不组织成为政党，与来自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坚决的斗争，行使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民主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已经取得的部分民主果实也会丢掉。

只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才能够对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定科学的民主革命纲领。当前黑帮的阶级基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诉求等在具体内容上相比1989年或许发生变化，但是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依然是无产阶级的任务。正如列宁对中国民主主义的评价：“它<指中国无产阶级——笔者注>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1卷432页）未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继承和发展1989年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内核，同时克服其局限性，以便在更高的基础上重新开始。